

專輯論文

傳、幫、帶：民國新聞記者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以《大公報》為例

路鵬程

摘要

《大公報》通過傳遞新聞產制隱性知識，幫助建構新聞採訪關係網絡，帶動樹立新聞職業道德，不僅訓練出當行出色的報人，而且訓育出對報館忠誠不渝的同人，從而實現報人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新聞報館推行的充滿中國傳統倫理色彩的「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高等專業教育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隱性知識、關係網絡、職業道德、倫理化的新聞專業主義

路鵬程，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中國近代新聞記者的職業生涯、新聞專業主義。電郵：ever_running@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5年3月5日。論文接受日期：2015年11月20日。

The Mentoring Mode of “*Chuan, bang, and dai*”: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a Kung Pao*

Pengcheng LU

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the newspaper *Ta Kung Pao* achieved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by spreading tacit knowledge, building networks, and promoting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journalism. In the case study of *Ta Kung Pao*, the mentoring mode “*chuan, bang, and dai*” reflects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This pattern has influenced and restricted the efficiency and the effects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in newspaper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also reveals the complicate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journalism and the modern mode of journalism that is taught in contemporary terti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Keywords: implicit knowledge, *Guanxi*, professional ethics, ethical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m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Lu, P. (2016). The mentoring mode of “*chuan, bang, and dai*”: The profess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journalis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A case study of *Ta Kung Pao*.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6, 35–68.

Pengcheng L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odern history of journalists,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m.

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還遠處於幼稚的時代」(張君良, 1935), 當時「考我國各地報紙所用人員, 來自新聞學校者, 不足百分之一。」(趙君豪, 1938: 200) 因此, 在推進記者職業社會化過程中, 一些著名新聞報館發揮的作用不亞於那些知名的新聞院校。正如, 民國知名報人金雄白形容他初進《時報》工作, 「正像梨園子弟的進入科班」(金雄白, 1988: 124); 于友說起他工作過的《立報》, 則滿懷敬意和感激地稱之為「我的大學」(于友, 2002: 220-223); 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高材生鄒韜奮甚至認為新聞報館給予他的教益遠高於新聞院校, 「我在時事新報館工作的一年, 是我生平更有意義的『練習』的時期。我常覺得我的這一年的『練習』, 比進甚麼大學的新聞科都來得切實, 來得更有益處。」(鄒韜奮, 2004: 184-185)

新記《大公報》(以下簡稱《大公報》)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報紙, 而負責報館人事工作的總經理胡政之, 一般情況下「從不錄用那些已經成名的人, 認為這種人很可能要一陣就走, 於事業無補。他看中的是可以培養造就的新秀, 給予充分的機會在實踐中鍛煉成長。」(詹若文, 1990) 但胡政之又深刻地意識到培養優秀的新聞記者是極其困難的, 他指出, 「俗話說, 三年可以出個狀元, 而不能出一個唱戲的叫天(著名京劇演員——引者註)。我說十年可以出個叫天, 而不能出一個好的新聞記者。」(1943a) 這表明《大公報》從1926年續刊, 迅速異軍突起, 在成長為民國最著聲譽報紙的過程中形成了頗具特色且極富成效的「傳幫帶」制度和實踐(曹世瑛, 1991), 在推動民國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方面做出了卓爾不群的突出貢獻。恰如《大公報》出身的著名報人徐鑄成說: 「在培養新聞界人才方面, 《大公報》可以說是一個『科班』。解放以前, 從這個『科班』出身的, 該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罷。」(2009a: 105) 本文主要研究《大公報》的「傳幫帶」制度和實踐, 試圖通過深描一個典型個案, 藉此由點帶面地描述和勾勒出民國報人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的深刻內涵、豐富情形及其顯著特徵。

近三十多年來, 《大公報》可能是民國時期被研究最多的報紙, 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蔚為大觀。¹ 其中, 《大公報》的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亦是論者最熱衷探討的話題之一。然以往關於此話題的論述多重在記錄時人所作所為的具體史實, 而罕有描寫時人所作所為背

後深蘊的認知情境、情感價值和意念態度。為此，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借取當代史家羅志田先生提倡的「見之於行事」的研究策略，「即不僅寫實，亦兼寫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時，更從情緒和心態視角頡取時人關注的重點，特別是那些帶有傾向性而又往往為我們既存史學言說所忽略的面相，試呈現史事神韻之一二。」(2006：20)另則，以往相關研究，偏好取籍西方理論剪裁民國史事，這導致時常會出現楊國樞教授所批評的那種尷尬境地，「西化的社會科學，常以盲目而不加批判的方式照抄、照搬、照套西方的理論、概念、方法及工具，難以完整、深入、細緻而有效地瞭解所研究之當地人與當地社會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為此，本文借鑒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研究取向，主要從當事人，並參以「重要關係人」(significant others) (李金銓，2013)，他們自己講述如何培養和成為「大公報人」的故事中提煉出其核心概念「傳幫帶」，並以此與西方相關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理論相互闡發和互相發明，²藉此以期更為妥帖地認識和闡釋《大公報》職業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的深刻內涵、豐富情形及其顯著特徵。

本文所謂的「傳幫帶」是，報館前輩報人在訓育後進新人時，繼承發揚中國傳統「師徒制」言傳身教的訓練模式，融合儒家傳統「書院式」優遊浸潤的教學方式，通過傳授新聞產制知識，協建新聞採訪網絡，砥礪新聞職業道德，從而使報界新人逐漸積累起開展新聞工作所必需的專業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道德資本藉此完成職業社會化，將其培育為當行出色的報人。前輩與後進之間朝夕相處，情分自生，兼之技藝相傳，道義相勉，使他們結成亦師亦友的深情厚誼，形成一個高度倫理情誼化的組織。(梁漱溟，2011a：160-161)報界新人處此倫理情誼化的組織之中，在良師益友知行情意的全面濡染浸潤之下，化育出對報紙宗旨理念的深切認同，對報紙言論風格的自覺踐行，對報紙組織團體的忠誠不渝，換言之，即逐漸樹立起對新聞組織的規範忠誠、工具忠誠和情感忠誠，藉此實現報人的組織社會化。(鄭伯璦、姜定宇，2008)講求知行情意全面訓育的「傳幫帶」制度，與以倫理情誼為本原，以專業追求為目的報館組織相輔相成，相因相進，將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貫通一氣，使報人在完成職業化的同時亦實現其組織社會化。



新聞採寫既是界定記者職業屬性的專業知識基礎，又是決定記者職業成就的核心專業技能，因此是「傳幫帶」的首要內容。天津《大公報》報館起初是由採寫編評樣樣當行出色的何心冷來專門負責「傳、幫、帶」招考進來的練習生（曹世瑛，1991）。1928年中學畢業考入《大公報》做練習生的曹世瑛說，他「每天出去採訪消息，回到報館寫成報導，交給何心冷。何心冷邊講評邊修改，然後加上標題送給本市新聞編輯。」新聞採寫知識可分為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和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前者指新聞採寫的基本知識和一般規則，後者指報人在經年累月的新聞實踐中摸索、創獲和積累下來的具有高度個性化和創造性的新聞產制心得與訣竅。報人的採寫能力來自於其顯性和隱性新聞採寫知識的相互促發和互相轉化，而在全面掌握顯性新聞採寫知識的基礎上，別出心裁地發揮隱性新聞採寫知識是最終決定報人採寫水準的關鍵（俞振華，2012：15-68）。何心冷在這裡不僅向曹世瑛講授顯性新聞採寫知識，更為重要的是，何心冷通過講解、評析、修改、潤飾，將自己在新聞編寫時，如何命題立意、謀篇佈局、遣詞造句等深嵌在其獨特心智結構和具體操作情境中的內在的、隱晦的、抽象的隱性新聞採寫知識，加以顯性化、清晰化、具象化，傳教給曹世瑛。而曹世瑛在旁仔細觀摩、專心揣摩，然後勤加練習、反復實踐，將何心冷講授的顯性知識與啟發的隱性知識內化為採訪心得，轉化為寫作訣竅。恰如曹世瑛自己感到，這樣「通過講評批改，提高了寫作能力，也學著怎樣當編輯。」（周雨，1991）正是在何心冷的悉心傳授、全力幫助和熱忱帶領之下曹世瑛獲得長足進步，很快便能適應報館工作環境，勝任新聞工作要求。與曹世瑛中學同學，並同期考入《大公報》做練習生的孔昭愷（1991：7）也深懷感激地說「在這段時間裡，我受他（何心冷——引者註）的教益頗多。」當然，「傳幫帶」新聞採寫知識，特別是隱性新聞採寫知識，既需傳者誨人不倦，亦要受者學而不厭，對傳授雙方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大公報》挑選用人都錄取那些可以栽培的材料。如發現誰個不稱職，便斷然解聘。」（李純青，1994：521）

對於從中學生中招考進來毫無新聞工作經驗的練習生，《大公報》通常安排專人通過規範系統的「傳幫帶」方式全面傳授新聞採寫知識。而對於初具新聞採寫知識的大學生，或已有相當新聞採寫能力的新同人，報館則是針對個人稟賦和條件，採取個別性的、隨機性的「傳幫帶」方式重點傳授隱性新聞採寫知識。北京師範大學的徐鑄成進入天津《大公報》後，胡政之和張季鸞常向他講授採訪「關鍵在哪裡？哪些雖是新發生的事，而不值得採訪？」當徐鑄成在社會新聞報導中暫露頭角之後，胡政之和張季鸞立即讓他開始試跑政治新聞，畀以重任，予以歷練，藉以培養。而與此同時張季鸞更是語重心長，「每次必詳細交代任務，此行重點注意哪些方面，哪裡可能會發生甚麼變化，該找甚麼人去瞭解真實情況。」徐鑄成說：「在胡、張的指引下，我心領神會，在馮、閻合作反蔣以及兩廣組織反蔣政府時，曾採訪過不少內幕的『獨家新聞』」，從此開始在報界聲名鵲起。而後，張季鸞又培養他如何寫評論，徐鑄成回憶說，張總是孜孜不倦和他「談論寫評論的『要訣』」（徐鑄成，2010a：96-98, 274）。胡政之、尤其是張季鸞將自己畢生淬煉積澱的新聞採寫「關鍵」、新聞評論「要訣」等隱性新聞採寫知識，耳提面命，悉相傳授給徐鑄成，徐氏不僅能夠立即心領神會，進而還能出神入化地創造性運用，迅速成長為享譽大江南北的一代著名報人。如果說《大公報》「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其所能賦予報人「燕京」和「復旦」所不能傳授的，可能就是這種隱性新聞知識。所以，畢業於北京大學的許君遠滿懷感激且充滿自豪地稱，「《大公報》是我的研究院。」（許君遠，2010）

《大公報》「傳幫帶」雖然借鑒中國傳統「師徒制」的訓育模式，但是摒棄了其形式呆板、內容僵化、條件苛刻的內在缺陷。因為與作坊商號錄用的徒弟夥計素質不齊，品類混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是，《大公報》聘用的記者無論學歷高低，多是天資聰慧可堪造就之才。這種報界精英「總會因自信而自尊，不甘俯首貼耳，不願籠頭被勒得太緊，妨礙放足奔馳；還難免有些桀驁不馴的『野性』。」（徐鑄成，2009b：85）為此，報館在「傳幫帶」中又融合了儒家傳統「書院式」優遊浸潤的教學作風。前輩報人注重言傳身教，以身垂範，後輩報人經由耳濡目染，逐漸潛移默化。張季鸞和胡政之無論在緊張工作之中，還是消閒娛樂之

暇，常隨時隨地給予記者有形無形的傳授、幫扶、帶教。老同仁王芸生深有體會地說，「每次見到季老（張季鸞——引者註），與他談話，必能得到新的啟發。」（王芝琛，2001：39）而新同事李俠文領會到在胡政之看似海闊天空的閒談中「每一段話都包含著經驗和啟示。」（2009）同人們普遍深切體會到前輩教誨青年，提攜後進的熱切和苦心，「他在談話裡恨不得把他所有的經驗都告訴你，希望你立即成為一個得力的新聞記者。」（李俠文，2009）張、胡率先垂範在報館內宣導前輩後進、行家新手之間「傳幫帶」的風氣，並逐步形成人人盡責，代代傳承的「傳幫帶」的習慣。恰如李俠文所說，正是「這種愛護提攜青年的熱情，使報館不斷發生新陳代謝的作用。老同事曹谷冰、金誠夫、李子寬、王芸生等一直是這樣在做的。」（2009）許多大公報人在多年後回憶起張季鸞、胡政之以及其他同仁先進當年的栽培之情都仍然不勝感念。例如，當時還是《大公報》滬、港館年輕編輯，後來成為著名報人和武俠作家的查良鏞說：「我常常想起他（胡政之——引者註）那些似乎平淡無奇其實卻意義精湛的話來」，「這位偉大的報人對於一個年輕的新聞工作者生活與學習上所發生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1949）在同人中，有如是感受和想法者，不勝縷列。

成為成功記者不僅需要在文化資本層面具備堅實深厚的新聞知識，而且還需要在社會資本層面擁有練達豐厚的關係網絡，在倫理本位的民國社會（梁漱溟，2011b：82），記者關係網的大小疏密決定著其新聞網的規模效率（路鵬程，2012）。所以，胡政之常教導青年記者說：「做外勤的人，首先須在社會上建立好多方面的聯繫。有了這種基礎，不但新聞來源不竭，而且有時新聞還會自動送上門來。」（1943b）對於因政治軍事新聞迅捷靈確而聲名鵲起的《大公報》，關係網絡尤為重要。正如民國知名記者趙效沂所指出的，「採訪軍事政治要聞，與採訪經濟、社會、教育微有不同，對於後者，手腳如果勤快，尚可由相當收穫；前者不能靠『硬闖』。各方關係夠，知你甚深，有時你在家睡覺，也會有人告訴你重大的消息。」（1972：159）年輕記者初涉人世，人輕勢弱，憑一己微薄之力開闢關係網絡自然事倍功半，如能在人情練達、人脈深厚的前輩報人悉心傳授，熱心幫助，盡心帶教之下建構關係網絡必然事半功倍。

張季鸞和胡政之早年留學日本時期，與民國各界領袖多為師友同志，棄政業報後又廣肆交遊，天津《大公報》的客廳「常常是訪客接踵，座客常滿」(徐鑄成，2010a：80)，因而擁有通天入地的關係網絡。他們都注重將自己的關係網絡引介、傳遞給年輕的記者們，以提高其採寫績效，拓展其職業前景。中原大戰前夕，徐鑄成隻身入晉去採訪被閻錫山軟禁的馮玉祥時，張季鸞立刻函請兩位參與閻馮機密的好友李書城和劉治洲相與協助，為徐鑄成出色完成採訪任務助益良多(徐鑄成，2010a：150)。抗日戰爭期間，《大公報》桂館採訪課主任張蓬舟轉赴成都辦事處主任時，胡政之馬上給四川省主席張群和地方名流劉成勳寫信「惠予教益」，為張蓬舟在四川打開工作局面奠定深厚的人脈基礎(張蓬舟，1991)。解放戰爭時期，當國共和談的重心從南京轉移到上海，王芸生親自把中共上海辦事處發言人陳家康介紹給滬館採訪課記者周雨，以增強相關報導力量(周雨，1991)。《大公報》記者關係網在人人傳遞中層層擴展，在代代傳承中步步開拓，最終使報紙的新聞網以更為迅捷的速度，深入到更為廣泛的社會空間，採集到更多更動人的新聞故事。

《大公報》記者在民國波詭雲譎的政治態勢和細密嚴厲的新聞管制中採訪內情，曝光黑幕，難免干犯時忌，開罪權要，遭致牢獄之災，甚有性命之虞，但幸多有驚無險，即端賴報館同人借助其關係網絡，或掩護轉移，或保護營救，最終化險為夷。1947年6月，方蒙等八名報人及家屬在重慶被捕，各館同仁紛紛聲援。渝館經理王文彬四處奔走，滬館編輯張蓬舟因與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交情頗深，代表總經理胡政之給孫「寫了兩封信，打了三次電報，最後又打長途電話」要求放人，經多方努力，被捕同人最終全部陸續獲救。方蒙終身銘記他獲釋歸來時看到的那感人一幕，「我來到李子壩編輯部時，聽到爆竹聲聲，看到同志們舉杯祝酒的深厚情誼，不禁熱淚盈眶，感激不已。」(1991)此後不久，滬館記者唐振常又被「中統」特務抓去。時任總編輯的王芸生得知後，立即打電話給市長吳國楨，千方百計迫使他出面交涉，將唐振常放回(周雨，1991)。恰如胡政之所說，正是憑藉報館上下的人脈資源和關係網絡，「別人得不到的自由，我們卻還相當地能夠享受與運用。」(1943c)

報館前輩和同人利用自己的關係網絡，在消極方面保護年輕記者免受諸種惡勢力的威脅迫害為其新聞工作克服不利環境，在積極方面幫助年輕記者擴展社會資本為其新聞工作創造優勢條件。³這是《大公報》記者成名快，且名記者輩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新人成為報人，需習得專業文化資本和積累職業社會資本，但張季鸞指出，這些「都是做記者的工具，不是所以做記者的根本」。(1932)「做記者的根本」，是新聞道德。真正的記者需要大公無私地將其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傾注於為社會公共利益的服務之中，藉此建立起其崇高的專業品性和高尚的職業德行。這也是新聞教育關鍵之所在。正如民國知名新聞學者戈公振所說：「新聞學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學得實用的職業，是給他一種精神上的立腳點，指明他能夠站在應該站的地方。」(戈公振，1929)

張季鸞、胡政之認為，當時大多商業報紙專營營利，只圖賺錢，而一些政治報紙也囿於黨見，只為黨爭，都違背了報紙服務公眾利益的職業道德。針對時弊，《大公報》甫一創辦，便提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辦報精神，崇尚獨立、公正的新聞職業道德。並且張季鸞和胡政之不僅將「四不」精神標舉為報館的「最高言論方針」，而且也將其確立為報館「同人對人對事的指導原則。」(胡政之，1943d)為此，《大公報》在「傳幫帶」中不僅重視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的衣鉢傳承，而且特別強調新聞道德的薪火相傳。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同人曾敏之體會深切地說，《大公報》是「以『四不』培養了人才」(曾敏之，2001)。

首先，記者明瞭「四不」精神是踐行「四不」原則的前提基礎。孔昭愷說他初赴《大公報》北京辦事處做記者時，胡政之就「告誡不許拿外邊的钱。」(孔昭愷，1991：41)1935年，尚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的范長江，拜訪胡政之，提出採訪中國西北角的計劃，胡政之極為讚賞，立刻禮聘其為特派通訊員，並語重心長地教導范長江，只要「不求利、不貪名，誠實甘願做社會無名公僕，遲早是有成效的。」「一個新聞記者最重要是個『誠』」。面對報館「四不」精神的殷殷教誨，孔昭愷拳拳服膺，他說：「《大公報》的薰陶，它所標榜的『超然』態度漸漸鑽入我的腦際。」(1991：50)而范長江則對胡政之的一席話，興奮不已，決心以『誠』字為職業生涯的座右銘(方蒙，1989：104)。這不僅是孔、範兩人

的個人感受，其實代表了許多大公報人的共同體會。張季鸞和胡政之始終重視向同人宣講和闡釋「四不」精神，特別是隨著《大公報》在抗戰勝利後發展迅猛，數館並立，員工凡千數百人，胡政之益發強調在同人中教導貫徹新聞道德，他在此三五年中組織同人開會座談灌輸「四不」精神，僅留下記錄的就達十多次(胡政，2009)。

其次，作為一種實踐性道德，報館巨頭尤為注重以儒家傳統的身教原則(余英時，2005：421)，即以身作則，不言而教來「傳幫帶」「四不」精神。張季鸞、胡政之在身體力行「四不」精神上確實做得律己以嚴，貫徹始終。政府高層對張季鸞、胡政之青眼有加，一再敦聘入閣，但張、胡堅持議政而不從政。胡政之1946年被迫無奈參加「國民大會」，亦只簽到，不參會，敷衍過之；《大公報》營業發達，獲利豐厚，但張、胡堅決不謀私利，不置私產，悉數用來擴展事業。張季鸞生前「不計較個人生活及家人生產，他始終過著負債的生活」(《大公報》，1941)，病逝之後，家無餘財，遺孀餘孤，生活無著。是報館同人，感懷先賢，撫恤孤寡，供以生計。張季鸞、胡政之典範性地體現了報人的職業理想和理想的報人品性，在報館中樹立起崇高的道德威信。其人「實為同人所一致衷心崇敬」，其行「足資同人之觀摩奮勵」(德真，1949)。大公報人還將其濡染浸潤的新聞道德經驗上升為一種普遍的新聞道德教育原則，努力推而廣之到學界與業界之中。他們在新聞教研的公開講座、學術座談、研討論文中都熱情地宣揚這種教育原則。如1940年代初從《大公報》出來主持燕京大學新聞系的蔣蔭恩，他不僅指出，新聞道德教育「最重要者莫如教授之以身作則，使學生於耳濡目染之餘，在不知不覺間已受其薰陶而潛移默化。」(1944)而且也在教學中積極踐行這種原則。

再次，作為一種職業性道德，報館巨頭不僅身體力行「四不」精神，而且著力創造激勵和保障踐行「四不」精神的工作環境。只要同人的言論報導符合「四不」精神，有利民族和國家的進步，即使可能會給報館帶來相當的風險和嚴重的威脅，張季鸞、胡政之等報紙負責人也總是甘冒風險，大力支持同人篤守和實踐「四不」精神。1943年初《大公報》刊登通訊《豫災實錄》，披露河南大旱，天災人禍，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即使賣妻賣女為娼為奴換不回四鬥糧食，人們在饑寒交迫下

依然趨之若鶩。採寫這則新聞的記者張高峰說：「讓我感到的是，《大公報》敢於把一個24歲年輕記者如此尖銳地披露災情、批評政府的報導一字不改地刊登出來，不僅冒了相當的風險，更表明它作為一張有社會責任感和廣泛影響力的大報的用人之道和獨特風格。」（張高峰，2013）果然，張氏這篇尖銳報導加上王芸生犀利的評論，觸怒最高當局，《大公報》遭致停刊三天的處罰。但報館毫不為忤，依然如故地支持張高峰採寫出更多觸目驚心的軍政黑幕和社會悲劇。張高峰感慨萬千地說：「我感到大公報是支援記者的工作的，不然我便失去在報導中連續『闖禍』與國民黨對抗的勇氣。」（1991）范長江報導的有關中國共產黨紅軍動向、西北邊區軍政建設，陳凡揭露的有關國民黨政府湘桂潰退、廣州劫收等等，這些當局殫精竭力嚴密封殺的重大新聞，都是報館在高揚「四不」精神的旗幟之下，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刊諸《大公報》報端。報館年輕一代英勇無畏地傳承和踐行「四不」原則，也堅定了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堅持和闡揚「四不」精神的信心和決心，全館上下全力以赴去追求和實現「理想中之新聞事業」（胡政之，1932）。

又次，「傳幫帶」不僅是有效的新聞道德教育方式，同時也是有力的新聞道德監督機制。同人們密邇相處，坦誠相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這既使個體違反報館職業行為契約——職業道德時將面臨更大的心理壓力產生更強的良心自責，而且也使個體置於報館同人「經常、分散、點滴、防微杜漸」的監督之下，難以違反職業道德（趙心樹、陰衛芝，2006）。正如胡政之對同人所要求的，「萬一有絕少數人不能體會上述的信念（「四不」原則——引者註），而竟有自私自利營私害公之行為，則全體同人，應共起糾正之」（1943d）。當然，在「傳幫帶」之外報館還邀請社會各界監督同人職業操守（《大公報》，1935），並建立起嚴厲的新聞道德懲戒機制「對於品行不端，有虧新聞記者操守，……一經發現，就毫不留情的開除。」（詹若文，1990）

作為被胡適譽為「全國的輿論權威」和「中國最好的報紙」（1930），《大公報》倡導的「四不」精神融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和西方現代新聞理念的精義（李金銓，2013：409），高度凝練地概括和表達了民國報人新聞道德最高理想的共同追求和集體呼聲，因此對許多滿懷抱負和充滿理想的青年報人原本就極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當時新聞院系朝氣蓬勃

的年輕畢業生們都嚮往進《大公報》工作，兼之在報館巨頭的精神感召和同人的相互砥礪之下，「四不」精神銘刻於許多大公報人之腦府胸臆，深沉為其永不磨滅的職業操守和人格底色。老一輩報人楊曆樵深切地感受到，在張、胡「精神感召和人格領導的力量」的激勵和薰陶之下，「這種勇於犧牲和不畏艱苦的精神，多年來已浸漬在本報同人之間。」(1949)後一代同人曾敏之也敏銳地觀察到，「這種樂業敬業的精神，可以說陶冶了《大公報》全體同事形成強力的集體，也以『四不』培養了人才」(1989)。

《大公報》憑藉頗具特色且極富成效的「傳幫帶」制度，通過傳遞隱性知識，建構關係網絡，砥礪職業道德，成為民國時期推進記者職業社會化的佼佼者，培養出大批出類拔萃報業人才，從而創獲了舉世矚目的新聞功業。這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高度嘉許。正如與張季鸞，既合作又競爭，且瑜亮一時，並稱「北張南陶」的《新聞報》著名報人陶菊隱說，張季鸞「尤其對於革新版面，獎掖後進，頗有一套經驗。《大公報》人才輩出是和他主持編輯部分不開的。」(陶菊隱，2005：162)中共領導人周恩來也常說，「《大公報》培養了不少有用的新聞人才」(周雨，1993：269)。

二

《大公報》通過「傳幫帶」實現報人職業社會化，培養出一批出類拔萃的傑出記者，確實「不下於『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但《大公報》畢竟不是燕京和復旦的新聞系以培養報人職業社會化為根本目標。報人職業社會化只是《大公報》實現報人組織社會化的必要條件，前者是訓練做新聞當行出色的報人，後者是訓育對報館忠誠不渝的同人。

首先，「傳幫帶」蘊育出深厚的情感忠誠(鄭伯璵、姜定宇，2008)。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與後進朝夕相處，不僅技藝相傳，道義相勉，而且情誼相慰，恩義相結，年輕一輩對前輩的道德文章和提攜關愛，充滿崇敬之意與知遇之感，報館老中青三代人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孔昭愷，1991：42)。同人們無論是當時身在報館談及《大公報》，還是離開報館多年之後憶及《大公報》，都深情地把它當做「自己的『家』」

(徐鑄成，2009a：224—225)。以館為「家」，深刻反映出同人如家人骨肉之相愛，對報館充滿真摯而深厚的情感忠誠。甚至即使此去經年，睽隔千里，許多人依然魂牽夢繞著這個「家」。陳紀澄六十多歲在臺灣，「夢中所遇，還是這批人；眼前紙筆，似仍在編輯部中」(1972)。揆諸當時實際，確亦洵非虛言。這種情感忠誠在工作中表現為，愛崗敬業，烙盡職守，並且即使報館遭遇困境，亦能同舟共濟，齊克時艱。特別是在困苦卓絕的抗戰時期，大公報人的情感忠誠不僅受到嚴峻考驗，並且在嚴峻考驗中錘煉得愈益深沉厚重。重慶《大公報》六遭慘重轟炸，「館址被炸後，敵機猶在上空盤旋，員工同人不顧生死，冒險搶救」，而在空襲日夜不息的「『疲勞轟炸』期間，員工同人日夜擠於防空洞中，不得飽食，工作不輟」(曹谷冰、金誠夫，1991)。當時，張季鸞已沉疴染身，每況愈下，常在好友康心如的別墅中修養，那裡本有建築堅固、設施完備的防空洞，但每次躲空襲時，張季鸞都會來到簡陋的《大公報》防空洞。同人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恰如高集所說，這是因為「一個是《大公報》是大家的，他在最危險的情況下，不會離開大家。二是《大公報》是獨立的民間事業，他平常可以在朋友家養病，可以和官方人物打交道，但關鍵時刻，他一定要和事業同生死，共患難。」(高集，2007)這一切，讓當時主持報館工作的王芸生感動不已，他揮筆在社論中慷慨激昂地寫到，同仁們「那種忠勇精神，真令人感激落淚。……血火中的奮鬥，最足鍛煉鋼鐵意志；危難中的友情，更表現同胞愛的偉大。」(《大公報》，1939)恰如幾度與同人出生入死，始終與報館生死與共的詹若文感懷深切地說，在《大公報》「每個人都把報社工作和自己的事業結合在一起，全力以赴，蔚然成風」(1990)。

其次，「傳幫帶」化育出堅定的規範忠誠。張季鸞、胡政之等前輩不僅在日常新聞工作中大公無私地培養提攜同人，而且當同人遭遇危急困厄時更能大勇無畏地挺身而出保護營救。1947年，駐廣州記者陳凡橫遭逮捕，胡政之「打電話給粵當局，願意自行來粵作質。要求先將同事釋放。」(李俠文，1949)曾在《大公報》工作十多年的中共地下黨員李純青數十年後還滿懷感激地說：「至今我還感謝胡政之先生，我寫一篇過激的文章，國民黨當局很嚴重地追究責任，胡說，『他是我們的人，文章在我們報紙刊載，一概由我負責。』事息之後，他一句也沒有

告訴我。如此風格，乃能得幹部的信賴。」(2009：521)此類事例，不勝枚舉。張、胡等前輩對後進平順時悉心以育，困厄時戮力以護，在這種高度的利他主義精神和倫理主義作風的激勵下報館形成了濃厚的規範忠誠，即同人們為報館、為工作，甘於承擔義務責任，樂於奉獻付出。民國時期報人的職業流動率一般相對較快(路鵬程，2012)，而《大公報》的工資在報界僅屬中等水準，但多數報人卻能安之若素，服務始終，即是以奉獻精神和義務責任為核心的規範忠誠使然。楊曆樵說自己就是「因為受了政之先生的感召，所以後來雖然有幾次他就的機會，可是我從未考慮到離開這個崗位。」(1949)在胡政之「傳幫帶」的感化和召喚下，楊曆樵早已將規範忠誠內化為個人道德，從而能夠抵禦世俗誘惑，篤守新聞理想，與報館相始終。其實，這也是《大公報》人共同的精神信念和道德品格。正如李俠文指出，「許多同事大概有這種經驗，就是外面常有人以較高的待遇和較好的名義找去工作，但極少人願意離開，總覺得這個事業值得留戀」(2009)。現代新聞產品是高度組織化和規範化的產物，需報館各個部門和各個崗位的報人緊密協作和密切配合。而中國向來文人相輕，難與合作，易生嫌隙，當時「有許多事業機構中，隨時都鬧所謂『人事』糾紛」(陳凡，1949)，民國許多報紙的衰落甚至倒閉即源於此。眾所周知，《大公報》的人，左中右派畢集，「意見上的距離可能天差地別。」(朱啟平，1949)但「《大公報》人事糾紛比較少，即使有也沒有嚴重爆發，以致危害這個事業。」(陳凡，1949)即因同人們，素養高，總能彼此寬容；感情深，恆以對方為念。從而在報館裡、工作中能夠暫時擱置政見分歧，超越意識形態的對立，共同致力於追求新聞事業發展，最終使大公報社呈現出「各人都能尊重個性，也就能夠發揮個性」的朝氣蓬勃局面(胡政之，1946)。

最後，「傳幫帶」培育出強固的工具忠誠。這首先集中體現為同人生產出「一種文字典型」，即「大公報體」。(陳紀澄，1974)張季鸞和胡政之交誼三十年，同事十五年，朝夕相處，聲氣相求，所以「對世事論點相同，文字技巧也多處相似。」(陳紀澄，1974)而其他同人撰寫的時評社論風格「『暗合』或近似(張、胡——引者注)，而張、胡二人，又並不最後過目或修改。」正如深得張季鸞評論真傳，並曾主持報館社論工作的徐鑄成說，「這是因為，他們用耳濡目染的辦法，影響同事們，

使人不自覺地跟著他們走。」(2010a：99)即使在新聞報導中亦是如此。曾任滬館採訪課主任的周雨指出，「一般來說，採訪課記者能夠自覺地服從大公報的辦報方針，『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保持自己和報紙基本一致的立場。政治性新聞報導是這樣，一般社會新聞也都能注意不流於庸俗和低級趣味。」(周雨，1991)即使著名的「左派」記者范長江也感到在《大公報》，「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除『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胡政之要我寫的隱晦一些，並作一些小修改外，差不多我願意寫甚麼，就寫甚麼，我怎麼寫，《大公報》就照我寫的原文發表，從來沒有刪改過。至少我沒有發現他們刪改過。」(沈譜，2001：1189)這不僅是報館管理組織文化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而且按照美國新聞學者塔克曼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報紙實現新聞專業化的重要表徵之一，「對於記者和編輯雙方來說，專業性則意味著遵循他們所屬機構的報導風格和要求。」(2008：112)其次，工具忠誠還體現為記者自主自覺地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道德與能力。這既是前輩報人在「傳幫帶」中的殷切期望，如胡政之語重心長地說，「新同事要求進步和充實，只有自己的努力，不能期待別人來推動。」(胡政之，1947)亦是後輩記者在「傳幫帶」中的自覺追求，如曾敏之說，「經過他(胡政之——引者註)的言傳身教，我體認了嚴師的深意，因此以後兢兢業業，力求寸進，勤讀苦練，以期不愧於記者的本色。」(2001)同人們在「傳幫帶」中浸潤的，在工作中貫徹的這種「自覺的主動精神」實則為人之生命本性。按照著名學者梁漱溟的觀點來說，「生命本性可以說就是莫知其所止的無止境的向上奮進，不斷翻新。」(梁漱溟，2011c：35)所以，同人李俠文感慨萬千地說，《大公報》「不但啟示了怎樣做新聞記者，更重要的是教我們怎樣做人」(1949)。

三

「傳幫帶」是以「師徒制」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方式，其傳承職業理念與專業技巧時存在著標準的模糊性、授受的體悟性、過程的封閉性，因此在運作時必然帶有高度的個人經驗性和個體情景性，從而帶來不可避免的局限與不足。再則，在近代歐風美

雨的衝擊激蕩之下，自由、民主、權利、階級等學說思潮迭興，特別是在年輕一代知識份子中影響日深，這開始對準乎人倫情理，以倫理本位文化為核心的「傳幫帶」形成嚴峻挑戰。

新聞業本是自主自律的職業，「傳幫帶」又強調技藝傳習的個體自主性和道義相勉的個體自覺性，因而在此雙重作用下，對記者來說掌握隱形知識，積累社會資本，樹立職業道德的關鍵還在於他本人的自我學習、自我管理與自我創獲。特別是對於一些天資聰穎，又受過西式精英教育的大學生來說，他們認為從自我學習與自我創獲中獲得的經驗要高於報館在「傳幫帶」中所給予他們的教益。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的唐振常就指出，「常聽人言，大公報培養了不少人才。這個話看怎麼說。……歸根到底，要靠自己努力。正如文章做法、編輯手冊之無用，大公報是不會教一個新來者如何寫文章做編輯的。承認和重視你的努力，這就不錯了。」(1991)同樣是來自燕京大學，且個性浩烈的楊剛則更激烈地說道：「說大公報培養了我，我不承認。全靠我自己努力。」(唐振常，1991)當然，唐振常也承認，「芸老(即王芸生——引者註)這一代前輩，他們儘管往往是言之無心，你如果聽之有意，總是能學到一些有用之物的。」(1996：359)

《大公報》兩大巨頭張季鸞和胡政之都傾注心血於「傳幫帶」中培養後進，但新人們因機緣不同，與張、胡交往親疏不同，彼此之間的感情亦具等第差別。更為複雜的是「在華人文化中，由於強調人際之間的垂直關係，於是組織成員最為首要的效忠物件即為其直屬主管或最高主管，爾後才能對組織本身效忠。」(鄭伯璜、姜定宇，2008；張文強，2002)許多同人首先認同張、胡二氏，然後才認同報館，對張、胡的個人忠誠高於對報館的組織忠誠。楊曆樵、李俠文等受到其他報館和事業高薪延攬時，都是因感念胡政之「關愛備至」之情義而留在《大公報》(楊曆樵，1949；李俠文，2009)，而徐鑄成拒絕胡政之的挽留離開《大公報》後，則「曾屢次自問，如果季鸞先生還健在，我能否下這個斷然的決心呢？」(2009a：4)這就導致報館無形中形成張、胡兩派。1935年蕭乾從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畢業來到天津《大公報》工作時便發現這種情形，並且和一同新來的大學畢業生們對兩派人事活動均敬而遠之，自稱「大學生派」。(蕭乾，2010：48)特別是自淞滬會戰以後，張、胡

各主一方，這種情況變得愈形突出。如深悉報館情形的徐鑄成所說，「等到張季鸞先後領導漢口版及重慶版後，《大公報》顯然已變相分家了。漢口、重慶館的經理和編輯主任，他（胡政之——引者註）認為都是張的人。而香港館、桂林館由他直接創建、領導」（徐鑄成，2010a：85）。當然，張胡兩派都服膺和堅守「四不」精神，雖有競爭，有摩擦，並未產生威脅報館生存發展的尖銳衝突，但同人感到「畢竟有時對事業發展不利」（杜文思，1991）。不久之後，隨著張季鸞的逝世，胡政之獨掌大權，也就暫時緩解了這個尖銳的問題。但是，這種對立卻潛在地綿延衍生下來，在第二代《大公報》領袖中，形成徐鑄成、王芸生兩雄並立，各統一軍的格局，並且因為離亂睽隔、時代巨變以及種種孽緣際會的刺激和強化，竟成互不能容的局面，這是導致徐鑄成徹底離開《大公報》，另主《文匯報》的重要原因。⁴

《大公報》報館是高度倫理情誼化的組織，「傳幫帶」又是通過知、情、意的全面陶冶和訓育來推動組織社會化，同人情誼在團結組織和追求專業中居關鍵地位。儘管報館同人相處，「宛如家人兄弟」（胡政之，1943c），但即使真的同胞手足也有孽緣際會，反目成仇的時候，何況只是「宛若」家人兄弟。因此如果同人一旦情感生變就會極大地影響其對報館的組織認同，而個人的情感又是相當微妙含糊，並且有時又會變化莫測，這使組織認同難免遭受情理之外意料不到的威脅。1937年8月，日軍侵入上海，《大公報》滬館拒絕接受日軍檢查，自動閉館，遣散同人。對於一直視報為「家」的徐鑄成來說，失業對他造成的經濟打擊遠沒有解雇對他形成的情感衝擊來得深刻而久遠。他對此不僅一時難以釋懷，而且終身耿耿於懷。徐鑄成說，儘管「政之先生後來雖竭力想彌補他這一失著，但這一傷痕終究是難以徹底平伏的。1946年我終於最後辭別《大公報》，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2009a：225）1938年戰地歸來的范長江，向張季鸞提出要做編輯，但其生性活潑，初試一二，便難耐枯寂，斷然棄之，並因此一時「意氣用事」與張季鸞發生「激烈爭吵」。在一個高度倫理情誼化的組織，情感禮俗是凝聚和維繫其的基礎和核心，顯然「意氣用事」和「激烈爭吵」是對情感禮俗的嚴重威脅和衝擊，因此兩人彼此不容，徹底決裂。范長江隨即脫離曾對他大力提攜，使他大展身手，從而名滿天下的《大公報》（王芝

琛，2001：62-67)。此舉於個人、於報館，甚至於中共利用《大公報》開展抗戰統戰宣傳工作，皆非明智之舉，周恩來得知後惋惜不已。

《大公報》憑藉「傳幫帶」對記者進行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的訓育，儘管從理論角度上講，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相輔相成，相因相進，但在現實中，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有時也會遭遇到彼此對立的矛盾狀況和尷尬情景。例如當職業理念與組織利益發生衝突之時，記者應當捍衛崇高的職業理念還是忠誠於報館現實的利害關係，特別是當記者既抱持堅定新聞理想又對報館飽含著情深意重之時，這種矛盾則更為尖銳亦更難解決。1946年徐鑄成主持《大公報》滬版筆政時，大膽揭露滄白堂事件、校場口事件等國民黨製造的系列暴力事件，並旗幟鮮明地反對內戰，爭取民主，這引起國民黨當局強烈不滿。胡政之充滿擔憂婉勸徐鑄成改變立場，「你的言論態度，似乎太激烈些。要知道，我們報館有三百多職工，一旦把當局逼急了，把我們的報封了，幾百職工的生活問題如何解決？你想過沒有？」而徐鑄成忿然反對，「我主持上海版的言論態度，並沒有越出民間報應守的範圍。」正是這種職業理念與組織利益之間無法消解的矛盾衝突，加速了徐鑄成脫離《大公報》的步伐(徐鑄成，2010b：110-113)。

「傳幫帶」的局限性在《大公報》追求報業集團化管理體系中有時變得格外突出和刺目。抗戰勝利以後，《大公報》隨著事業的迅猛發展，成為規模龐大，部門複雜，規章嚴明的報業集團，報紙日益嚴重的科層制管理制度對充滿倫理情誼色彩「傳幫帶」慣習開始形成挑戰，而「傳幫帶」的標準模糊性和交往情景性使得這一挑戰變得更加緊張和尖銳。唐振常1946年夏進入《大公報》滬館，在新聞編輯「傳幫帶」下做助編新聞的經歷曾使他備感沉悶壓抑。「我坐在他的旁邊，幾乎無所事事，他只不過偶然從稿件堆中挑出幾條，叫我做個題目。多數情況是，他隨便看看我編的稿件就放在一旁，不改不動，也不交給鄰座的編輯主任。……我逐漸悟出了一條道理：大約交給我編發的稿件，本來就是不準備刊用的，無非找點事給我做做而已。我不明白，這是否大公報磨練新來者的通行辦法。這時想起了先我一年進重慶大公報的同學劉克林的話。他說：他工作之初，編輯拿過他編的稿子，從來不看，隨手扔入字紙簍。」(唐振常，1991)唐振常和劉克林的痛苦經歷反映出充

滿濃郁情義色彩的「傳幫帶」傳統在理性而冷漠的科層制衝擊下，其合法性和有效性逐漸減弱。隨後幾年，政治局勢和社會環境的急遽變化再沒有給《大公報》留下處理這對矛盾的時間和機會。

四

近代以還，處於從傳統到現代轉變中的中國仍然是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梁漱溟，2011b：77) 倫理社會即以家族主義為中心將家族的結構形態與運作規則、角色關係和倫理規範，類化、推廣、應用到社會情景和職業組織之中(楊國樞、葉明華，2008：245-246)。《大公報》即秉持家族主義實施倫理化的組織管理。正如張季鸞說，「我的思想，是贊成維持中國的家族主義，但是要把它擴大起來。擴大對父母對子弟的感情，愛大家的父母與子弟。」(1934：374) 胡政之亦懷此念，他常說：「本報是團體事業，同人相處，宛如家人兄弟」。(胡政之，1943c) 揆諸同人感受，確實如此。大家普遍感到，在報館裡「相處融洽，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就似一個大家庭。」(黃克夫，2002)

而講求知行情意全面訓育的「傳幫帶」既是貫徹和實現《大公報》家族主義倫理化組織管理的重要途徑，亦是反映其家族主義倫理化組織管理的重要表徵。報人在「傳幫帶」中的關係成分約為三種：首先是報館課以師徒各自職責義務所形成的規範性關係；其次為師徒在新聞知行授受傳習與相互協作完成採編工作中構成的工具性關係；再次，因師徒密邇相處、情意相投、日處日親形成的情感性關係。(楊中芳、彭泗清，2008) 其實，前輩報人是否能盡心盡力「傳幫帶」後輩記者無法按照規範性關係來辦，只能准乎情感性關係而定：情義深，傾其所能，盡相傳授，規範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都得以貫徹落實，且相得益彰；情義淺，例行公事，甚至敷衍了事，規範性關係和工具性關係均無從著落，變為一紙空文。記者通常都是憑藉經年累月的艱辛摸索和辛苦經營後才逐漸積累起其獨特的隱性知識體系和深厚的社會關係網路，他們正是藉此獲得相對他人的競爭優勢，在報界脫穎而出揚名立萬。而將其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傳授給別人則會喪失競爭優勢，所謂「教會徒弟，餓死師傅」，這種情況不是沒有。因此，從理性的角度來講，隱

性知識和關係資源的擁有者一般具有壟斷意識和獨佔心理，不願傳授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而從感性的角度來看，報館同事，朝夕相處，情分自生，更兼張季鸞和胡政之大力推崇家族主義，以倫理關懷來統攝凝聚同人，孕育葆養後進，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一些同人甚至在同舟共濟中結下生死不渝之情，這使報館同人才樂於分享自己積累的隱性知識和關係網絡，並且同心協力追求和砥礪新聞道德。放眼民國報界，儘管各家報館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的成效高低，各具差等，不一而足，但它們普遍都是以倫理化的職業教育和組織管理理念來推動其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

儘管民國仍是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但在歐風美雨愈來愈烈的風吹雨打之下，維繫倫理本位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開始動搖。而充滿倫理化色彩，准乎人倫情理的「傳幫帶」，在倫理本位開始失序解體的社會轉變之中，意欲維持其在團體組織中的順利運行，實際只有更多地訴諸個人道德的自覺修養。從報館組織層面來講，在《大公報》、《晨報》、《新民報》、《立報》等同人道德素養普遍較高的質報，即時人所謂「進步報紙」(林語堂，2008：109)，實施倫理化管理來推動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則成效顯著，而在同人道德素養，以及報館的專業文化資本、職業社會資本結構和水準參差不齊，甚至低劣不堪的量報、小報則成效千差萬別。正如民國知名新聞工作者和教育家詹文滸當時對這些報館「傳幫帶」訓育出來的記者所做的批評，「他們在過去未曾受過適當的新聞教育，對於新聞事業，不存甚麼理想，亦不作甚麼抱負，他們只在學徒或練習生時代，學得若干技巧，過去如何，現在照辦，絕對不思與時代並進，他們的發展，無論在年齡上或教育上，都受了限制。」(詹文滸，1994)

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在不同的時代、國家、地域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既有現今已呈席捲全球之勢的以美國為代表的新聞專業高等教育模式，但亦有如日本一樣迄今為止主要是通過在職培訓與師徒制度實現其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當然還有許多介於兩者，或兼而有之的國家和地域，如東歐、中東、中北非等國家和地區(沃爾-喬根森、哈尼奇，2004：46；Deuze，2006)。⁵民國時

期的中國新聞報館是通過倫理化的「傳幫帶」與新聞院校的專業高等教育共同承擔起中國近代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的重要任務，但兩者在構成和推動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事業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卻並非如許多時人或今人所認為的只是簡單的促進或對立關係，而是存在著錯綜複雜的互動關聯。質報「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式的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是相輔相成的。以《大公報》為例，其首先樂於聘請新聞院校的畢業生，如該報僅來自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的知名記者就有趙恩源、蔣蔭恩、蕭乾、朱啟平、黎秀石、劉克林、唐振常、譚文瑞等。《時事新報》、《晨報》、《新民報》等其他民國知名質報亦是如此。正如1936年時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梁士純就欣喜地看到，「在國內幾家頗有地位的報館的編輯部內，在最近四五年來所加入他們的工作人員，大多數是受過大學教育……大部分還是從新聞學校或學系所招來的」（1936）。其次，《大公報》亦熱衷給新聞院校捐贈資金，舉辦講座，提供實習，供給師資，盡己所能全力扶持新聞院校的發展（張詠、李金銓，2008）。甚至張季鸞還與徐鑄成相約計畫在抗戰勝利之後，同去燕京大學講學一年（徐鑄成，2009a：82）。雖然這因張氏身故而成遺願，但1942年燕京大學在成都複校重建新聞學系時，即得力於胡政之和「季鸞紀念獎學金保管委員會」捐贈的十萬元資金之助，《大公報》還派遣桂館編輯主任、燕大校友蔣蔭恩前往援教，出任系主任（袁昶超，1948）。而作為美國密蘇裡新聞學院在中國的翻版，燕京大學新聞學系強調在經驗豐富的報人教授指導下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培養新聞學子，具有強烈「師徒制」色彩（apprenticeship systems）（Reese & Cohen, 2000）。這與《大公報》的「傳幫帶」在培養理念和訓練方式上皆有款曲相通之處，亦或異曲同工之妙。而當時中國著名的新聞院系，如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中央政治學校都是亦步亦趨模仿「密蘇裡模式」而建立發展起來的。（張詠、李金銓，2008）這種「強調動手做和職業取向」的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模式與新聞報館的「傳幫帶」模式，前後銜接，相續為進，前者為記者提供入職必備的基本素養，後者進步增益記者職業發展所需的高級技藝，兩者通力合作共同促進中國近代新聞記者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

然而，當時中國報界的普遍狀況卻並不如上述精英新聞報館和著名新聞院系通力合作那樣樂觀和振奮。絕大多數量報、小報的「傳幫帶」與新聞院校專業高等教育在記者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發展歷程中常常呈現出令時人不勝憂慮的對立和衝突。這首先表現在他們普遍認為，報館是最佳的新聞學校，斷無在報館以外習得新聞事業之理(郭步陶，1935)。兼之，當時「許多新聞學科畢業的學生，因為沒有實現機會，故其能力往往還不及沒受過訓練的老資格記者。」(張君良，1934)因此，他們只願僱傭報館「傳幫帶」式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模式下訓練出的「熟手」，而不願聘任新聞院系的畢業生，以便「省卻麻煩，不必從頭到尾，重新訓練」(詹文滸，1944)。其次，正如當時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謝六逸所指出，「在報館主持人之心理……尤覺新聞學校畢業之學生，希望過奢，志氣太高，患其調動不易；或恐其濫作高論，提倡改良，影響營業。」(惜瑩，1935)當然，當時新聞院校亦參差不齊，所造就的人才也深淺不一。「畢業出去的，少不了有些是粗製濫造。」(郭步陶，1935)這更加強化了報館拒絕僱傭新聞院校畢業生的守舊心態和保守做法。這種傳統與現代職業社會化、組織社會化模式的緊張與衝突，使時人痛心疾首地感到，「這是中國報業的重大損失」(詹文滸，1944)。

概而言之，民國時期以新聞報館「傳幫帶」為代表的傳統式、個體化的新聞記者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模式，與新聞院校推進的現代化、制度化的職業社會化和組織社會化模式在極少數報人道德素養普遍較高的質報中相輔相成，且相得益彰，而在絕大多數同人道德素養和新聞專業程度均較低下的量報、小報中則充滿緊張，甚至對立衝突。從1920年代末起，以戈公振為代表的民國報業有識之士一直在呼籲新聞報館與新聞院校打破壁壘，通力合作(戈公振，1929)，主要也是針對後者而言，但直至1948年白寶善還是失望地看到，兩者之間存在一道鴻溝(白寶善，1948)。這導致中國報界質報和量報、小報的報人素養和職業水準嚴重分化並持續擴大，從而使民國新聞界的專業化之路變得更加多歧而漫長。

註釋

- 1 僅以《大公報》為題名的論文就達千餘篇，此外關於《大公報》知名記者、關鍵事件、重要報導的個案研究數量也相當可觀，而有關《大公報》的專門著作亦有多部問世，其中不乏在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力作。這些研究幾乎涵蓋了《大公報》從傳者、傳播內容、傳播媒介、傳播效果到受者的所有面向。
- 2 新聞傳播研究者頗為關注職業社會化理論和問題，源遠流長，積澱豐厚。雖然新聞傳播研究者亦較為關注組織社會化問題，但卻很少著意發展經年、成果豐碩的組織社會化理論，特別是在國內將組織社會化理論應用於新聞組織的系統研究目前尚付闕如。有關組織社會化理論代表性的綜述研究可參見Bauer, T. N., Morrison, E. W., & Callister, R. R. (1998).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 review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Ferris G. R., Rowland K. M. (Ed.). *Research in personnel management, Greenwich* (pp. 149–214). CT: JAI Press; Fisher C. D. (1981). The multiple socialization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 309–318.
- 3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甘斯在探討美國現代新聞業時也發現，專門負責某一條線和領域的專線記者由於經年累月與消息來源朝夕相處，形成極其密切的關係。「其結果是，記者陷入與消息來源之間各自負有責任義務的共生關係之中」(赫伯特·甘斯，2009)。《甚麼在決定新聞：對CBS晚間新聞、NBC夜間新聞、〈新聞週刊〉及〈時代〉週刊的研究》(石琳、李紅濤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66–167。在瑞典、丹麥、韓國、日本的研究中，都發現了記者與消息來源存在著這種親密的「共生關係」。相關較為詳盡的綜述研究參見，卡琳·沃爾-喬根森、湯瑪斯·哈尼奇(2014)。《當代新聞學核心》(張小婭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56。只是在民國時期，這種「共生關係」嵌入到中國傳統關係網之中，使記者與消息來源在理性計算、情感聯繫和道德義務等人情倫理體系的三重力量制約下，形成一種交往更密、交情更深、結交更牢固的高度責任義務關係網路。當然，其產生的消極後果也更為嚴重。相關詳細討論可參見，路鵬程(2012)。〈民國記者的關係網與新聞採集網〉。《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108–113。
- 4 這種現象在今天中國報界依然存在。相關討論可參見張文強(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第73期，頁29–61。
- 5 今天許多中國研究者和從業者在感歎「傳幫帶」的逐漸消逝，同時也在強

烈呼籲新聞組織繼承發揚「傳幫帶」精神，重建光大「傳幫帶」制度。相關討論可參見，樊娟(2005)。〈「傳幫帶」需要制度保證〉。《中國記者》，第8期，頁94；童鐘鳴(2009)。〈今天更應提倡「傳幫帶」〉。《中國記者》，第7期，頁18-19；等等。從全球範圍來看，也有研究者強調加強對類似「傳幫帶」的新聞機構內部培訓的研究。正如比特·約瑟菲(Beate Josephi)所指出的，「學習新聞的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在這個行業就職。因此，對於新聞教育的研究擴展，包括在高等教育之外接受的培訓，比如在編輯部或在媒體業界，來描述塑造新聞的力量的完整畫面」(卡琳·沃爾-喬根森、湯瑪斯·哈尼奇(2014)。《當代新聞學核心》(張小嫻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頁56)。相關詳細討論還可參見，de Burgh, H. (Ed.). (2005). *Making journalists: Diverse models global issues* (p. 223), London: Routledge.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于友(2002)。《記者生涯繽紛錄——獻給傳媒後來人》。北京：新華出版社。
- Yu You (2002). *Ji zhe shengya binfen lu—xiangei chuanmei houlairen*.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大公報》(1935年7月12日)。〈本社聲明〉。
- Dagongbao (July 12, 1935). Benshe shengming.
- 《大公報》(1939年5月4日)。〈血火奮鬥〉。
- Dagongbao (May 4, 1939). Xuehuo fendou.
- 《大公報》(1941年9月11日)。〈敬悼季鸞先生 本報港桂兩版社評〉(港版)。
- Dagongbao (September 11, 1941). Jingdao Jiruan xiansheng benbao gangui liangban sheping (gangban).
- 《文匯報》(1946年1月25日)。〈文匯報精神〉。
- Wenhuihao (January 25, 1946). Wenhuihao jingshen.
- 戈公振(1929)。〈新聞教育之目的〉，《報學月刊》第1卷第2期。龍偉等(編)，(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1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Ge Gongzhen (1929). Xinwen jiaoyu zhi mudi, *Baoxueyuekan*, 1(2). Long Wei et al., (Ed.). (2010),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15).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方蒙(1991)。〈重慶記者被捕前後〉。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245-

- 251)。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Fang Meng (1991). Chongqing jizhe beibu qianhou.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u* (pp. 245–251).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王芝琛 (2001)。《百年滄桑：王芸生與〈大公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 Wang Zhichen (2001). *Bainian cangsang: Wang Yunsheng yu Dagongbao*. Beijing: Zhongguo gongren chubanshe.
- 卡琳·沃爾-喬根森、湯瑪斯·哈尼奇 (2014)。《當代新聞學核心》(張小姪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Wahl-Jorgensen. K. & Hanitzsch. T. (2014). *Dangdai xiwenxue hexin* (Zhang Xiaoya trans). Beijing: Qinghua daxue chubanshe.
- 孔昭愷 (1991)。《舊大公報坐科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Kong Zhaokai (1991). *Jiu Dagongbao zuike ji*.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白寶善 (1948)。〈論新聞系與新聞界之合作〉，《報學雜誌》第1卷第7期。龍偉等 (編) (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29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Bai Baoshan (1948). Lun xinwenxi yu xinwenjie zhi hezuo, *Baoxue zazhi* 1(7). Long Wei et al. (Ed.). (2010), *Minguo jiaoyu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292).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朱啟平 (1949)。〈以工作代哀思〉，《大公報》港版1949年4月21日。胡玫、王瑾 (編) (2009)，《回憶胡政之》(頁3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Zhu Qiping (1949). Yi gongzuo dai aisi, *Dagongbao* bangban (April 21,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37).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許君遠 (2010)。〈糊裡糊塗地進了新聞界〉。眉睫、許乃玲 (編)，《讀書與懷人：許君遠文存》(頁200)。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
- Xu Junyuan (2010). Huli hutu de jinle xinwenjie. Meijie, Xu Nailing (Ed.). *Dushu yu huiren: Xu Junyuan wencun* (p. 200). Beijing: Zhongguo chang'an chubanshe.
- 李金銓 (2013)。〈記者與時代相遇〉。李金銓 (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40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Li Jinquan (2013). Jizhe yu shidai xiangyu. Li Jinquan (Ed.). *Baoren baoguo—zhongguo xinwenshi de ling yizhong dufa* (p. 407).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李俠文 (1949)。〈我所認識的張季鸞、胡政之兩先生〉，《大公報》港版1949年

- 4月21日。胡玫、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9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Li Xiawen (1949). *Wo suo renshi de Zhang Jiluan, Hu Zhengzhi liang xiansheng, Dagongbao gangban* (April 21,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9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李俠文(2009)。〈精神 事業 做人——敬悼政之先生〉。胡玫、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2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Li Xiawen (2009). *Jingshen, shiye, zuoren—jingdao zhengzhi xiansheng*.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23).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李純青(1994)。《筆耕五十年》。北京：三聯書店。
- Li Chunqing (1994). *Bigeng wushi nian*.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余英時(2005)。《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
- Yu Yingshi (2005). *Xiandai weiji yu sixiang renwu*.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陳凡(1949)。〈我所見的 我所佩的〉，《大公報》港版1949年4月21日。胡玫、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3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Chen Fan (1949). *Wo suojian de, wo suopei de, Dagongbao gangban* (April 21,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38).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陳紀澄(1972)。〈一代論宗哀榮餘墨〉，《傳記文學》1972年第4期。轉引自郭恩強，(2013)，《重構新聞社群：新記〈大公報〉與中國新聞業》(頁22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Chen Jiying (1972). *Yidai lun zong airong yumo, Zhuanji wenxue 4*. Zhuanyin zi Guo Enqiang (2013), *Chonggou xinwen shequn: Xinji Dagongbao yu zhongguo xinwen ye* (p. 220).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陳紀澄(1974)。〈憶胡政之〉，《胡政之與大公報》。胡玫、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6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Chen Jiying (1974). *Yi Hu Zhengzhi, Hu Zhengzhi yu Dagongbao*.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68).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杜文思(1991)。〈抗戰前夕大公報面向全國發行的設想〉。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53)。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Du Wensi (1991). *Kangzhan qianxi Dagongbao mianxiang quanguo faxing de shexiang*.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u* (p. 53).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林語堂 (2008)。《中國新聞輿論史》(王海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in Yutang (2008). *Zhongguo xinwen yulun shi* (Wanghai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 張文強 (2002)。〈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新聞工作自主：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新聞學研究》，第73期，頁29-61。
- Zhang Wenqiang (2002). Meijie zuzhi neibu quanli yunzuo yu xinwen gongzuo zizhu: Fengjian caiyi nei de quanli kongzhi yu fankang. *Xinwenxue yanjiu*, 73, 29-61.
- 張君良 (1935)。〈新聞教育機關與報業協作〉，《報學季刊》第1卷第2期。龍偉等 (編) (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6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Zhang Junliang (1935). Xinwen jiaoyu jiguan yu baoye xiezuo, *Baoxue jikan*, 1(2). Long Wei et al. (Ed.). (2010),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60).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張季鸞 (1934年12月25日)。〈歸鄉記〉。《國聞週報》，第374頁。
- Zhang Jiluan (December 25, 1934). Guixiang ji. *Guowen zhoubao*, 374.
- 張季鸞 (1932)。〈諸君為甚麼要做新聞記者〉。燕京大學新聞系 (編) (1932)，《新聞學研究》(頁4)。北京：燕京大學出版社。(需指出的是，該書每篇文章均獨立編頁。)
- Zhang Jiluan (1932). Zhujun weishenme yaozuo xinwen jizhe. Yanjing daxue xinwenxi (Ed.). (1932), *Xinwenxue yanjiu* (p. 4). Beijing: Yanjing daxue chubanshe.
- 張詠、李金銓 (2008)。〈密蘇裡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 (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頁301-305)。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Zhang Yong, Li Jinqun (2008). Misuli xinwen jiaoyu moshi zai xiandai zhongguo de yizhi — jianlun diguo shiming: meiguo shiyong zhuyi yu zhongguo xiandaihua. Li Jinqun (Ed.). *Wenren lunzheng: Zhishi fenxi yu baokan* (pp. 301-305). Guangxi: Guangxi daxue chubanshe.
- 張高峰 (1991)。〈採寫戰地通訊〉。周雨 (編)，《大公報人憶舊》(頁95)。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Zhang Gaofeng (1991). Caixie zhandi tongxun.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u* (p. 95).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張高峰 (2013)。〈1942年〈大公報〉怎樣披露河南大災〉(遺稿)。《炎黃春秋》，第4期，頁80-90。

- Zhang Gaofeng (2013). 1942 nian *Dagongbao* zenyang pilu henan dazai (yigao). *Yanhuang chunqiu*, 4, 80–90.
- 張篷舟(1991)。〈我在大公報的經歷〉。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36)。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Zhang Pengzhou (1991). *Wo zai Dagongbao de jingli*.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u* (p. 36).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鄒韜奮(2004)。《經歷》，三聯書店，第184–185頁。
- Zhou Taofen (2004). *Jingli*, Sanlian shudian, 184–185.
- 范長江(2001)。〈我的自述〉。沈譜(編)《范長江新聞文選》(下卷)，北京：新華出版社。
- Fan Changjiang (2001). *Wo de zishu*. Shenpu (Ed.), *Fan Changjiang xinwen wenxuan* (xiajuan).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周雨(1991)。〈滬館採訪課紀實〉。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111)。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Zhouyu (1991). *Huguan caifang ke jishi*.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u* (p. 111).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周雨(1993)。《大公報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Zhouyu (1993). *Dagongbao shi*.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 趙心樹、陰衛芝(2006)。〈「心中之規」最具道德權威——新聞職業倫理規範問題答問〉。《新聞記者》，第8期，頁7–12。
- Zhao Xinshu, Yin Weizhi (2006). *Xinzhong zhi gui zuiju daode quanwei — xinwen zhiye lunli guifan wenti dawen*. *Xinwen jizhe*, 8, 7–12.
- 趙君豪(1938)。《中國近代之報業》。上海：上海申報館。
- Zhao Junhao (1938). *Zhongguo jindai zhi baoye*. Shanghai: Shanghai shenbaoguan.
- 趙效沂(1972)。《報壇沉浮四十五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 Zhao Xiaoyi (1972). *Baotan chenfu sishiwu nian*. Taipei: Zhuanji wenxue chubanshe.
- 楊中芳、彭泗清(2008)。〈人際交往中的人情與關係：構念化與研究方向〉。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冊)(頁469–504)。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Yang Zhongfang, Peng Siqing (2008). *Renji jiaowang zhong de renqing yu guanxi: Gounian hua yu yanjiu fangxiang*. Yang Guoshu, Huang Guangguo, Yang Zhongfang (Ed.). *Huaren bentu xinli xue* (shangce) (pp. 469–504). Chongqing: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 楊國樞、葉明華 (2008)。〈家族主義與泛家族主義〉。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冊) (頁245-246)。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Yang Guoshu, Ye Minghua (2008). Jiazu zhuyi yu fan jiazu zhuyi. Yang Guoshu, Huang Guangguo, Yang Zhongfang (Ed.). *Huaren bentu xinli xue* (shangce) (pp. 245-246). Chongqing: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 楊曆樵 (1949)。〈政之先生精神不死〉，《大公報》港版1949年4月21日。胡玫、王瑾 (編) (2009)，《回憶胡政之》(頁3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Yang Liqiao (1949). Zhengzhi xiansheng jingshen busi, *Dagongbao* gangban (April 21,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33).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鄭伯璜、姜定宇 (2008)。〈華人企業組織中的忠誠〉。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 (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下冊) (頁761-803)。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 Zheng Boxun, Jiang Dingyu (2008). Huaren qiye zuzhi zhong de zhongcheng. Yang Guoshu, Huang Guangguo, Yang Zhongfang (Ed.). *Huaren bentu xinli xue* (xiace) (pp. 761-803). Chongqing: Chongqing daxue chubanshe.
- 羅志田 (2006)。《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Luo Zhitian (2006). *Jibian shidai de wenhua yu zhengzhi: Cong xinwenhua yundong dao beifa*.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金雄白 (1988)。《記者生涯五十年》(上)。臺北：臺灣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Jin Xiongbai (1988). *Jizhe shengya wushi nian* (shang). Taipei: Taiwan yuesheng wenhua shiye youxian gongsi.
- 俞振華 (2012)。《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Yu Zhenhua (2012). *Renlei zhishi de mohui weid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查良鏞 (1949)。〈再也聽不到那些話了〉，《大公報》港版1949年4月21日。胡玫、王瑾 (編) (2009)，《回憶胡政之》(頁3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Zha Liangyong (1949). Zaiye tingbudao naxiehua le, *Dagongbao* gangban (April 21,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30).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適 (1930)。〈後生可畏〉，《大公報》1930年5月22日。
- Hu Shi (1930). Houshengkewei, *Dagongbao* (May 22, 1930).

- 胡政(2009)。<〈胡政之生平〉。胡政、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12)。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Mei (2009). Hu Zhengzhi shengping.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Hu Zhengzhi* (p. 1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1932)。<〈我的理想中之新聞事業〉。燕京大學新聞系(編)(1932)，《新聞學研究》(頁1-4)。北京：燕京大學出版社。(需指出的是，該書每篇文章均獨立編頁。)
- Hu Zhengzhi (1932). Wode lixiang zhong zhi xinwen shiye. Yanjing daxue xinwenxi (Ed.). (1932), *Xinwenxue yanjiu* (pp. 1-4). Beijing: Yanjing daxue chubanshe.
- 胡政之(1943a)。<〈在重慶對編輯人員的講話〉，《大公園地》第9期第1版1943年12月21日。王瑾、胡政(編)(2007)，《胡政之文集》(下)(頁108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3a). Zai Chongqing dui bianji renyuan de jianghua, *Dagongyuandi*, 9,1,(December 21, 1943). Wang Jin & Hu Mei (Eds.).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08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1943b)。<〈對桂林館編輯部同人的講話〉，《大公報》1943年7月5日。王瑾、胡政(編)(2007)，《胡政之文集》(下)(頁10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3b). Dui Guilin guan bianjibu tongren de jianghua, *Dagongbao*, (July 5, 1943). Wang Jin & Hu Mei (Eds.).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076).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1943c)。<〈回首壹拾柒年〉，《大公報》1943年9月5日。王瑾、胡政(編)(2007)，《胡政之文集》(下)(頁115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3c). Huishou yishiqi nian, *Dagongbao*, (September 5, 1943). Wang Jin & Hu Mei (Eds.). (2007),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150).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1943d)。<〈本報「社訓」和「同人公約」的要義〉，《大公園地》第8期1943年9月20日。王瑾、胡政(編)(2007)，《胡政之文集》(下)(頁1058)。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3d). Benbao Shexu he Tongren gongyue de yaoyi, *Dagongyuandi*, 8 (September 20, 1943). Wang Jin & Hu Mei (Eds.). (2007),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058).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1946)。<〈追念張季鸞先生〉，《大公報》1946年9月1日。王瑾、胡政(編)(2007)，《胡政之文集》(下)(頁115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6). Zhuinian Zhang Jiluan xiansheng, *Dagongbao* (September 1, 1946). Wang Jin & Hu Mei (Eds.). (2007),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156).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胡政之 (1947)。〈對天津館編輯部同人的講話〉，《大公園地》復刊第7期1947年7月21日。王瑾、胡玫 (編) (2007)，《胡政之文集》(下) (頁11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Hu Zhengzhi (1947). Dui Tianjinguang bianjibu tongren de jianghua, *Dagong yuandi fukan* 7 (July 21, 1947). Wang Jin & Hu Mei (Eds.). (2007), *Hu Zhengzhi wenji* (xia) (p. 1103).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郭步陶 (1935)。〈造就新聞人才和辦理新聞事業有徹底合作到的必要〉，《新聞學期刊》第1期。龍偉等 (編) (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6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Guo Butao (1935). Zaijiu xinwen rencai he banli xinwen shiye you chedi hezuo de biyao. *Xinwenxue qikan*, 1. Long Wei et al. (Ed.). (2010),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61).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陶菊隱 (2005)。《記者生活30年——親歷民國重大事件》。北京：中華書局。
- Tao Juyin (2005). *Jizhe shenghuo 30 nian—qinli minguo zhongda shij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袁昶超 (1948)。〈中國的報學教育〉，《報學季刊》第1卷第5期。龍偉等 (編) (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2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Yuan Changchao (1948). Zhongguo de xuebao jiaoyu, *Baoxue jikan*, 1(5). Long Wei et al. (Ed.).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248).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高集 (2007)。〈我的姑父張季鸞二三事〉。《武漢文史資料》，第11期，頁19-25。
- Gao Ji (2007). Wode gufu Zhang Jiluan ersan shi. *Wuhan wenshi ziliao*, 11, 19-25.
- 唐振常 (1991)。〈上海大公報憶舊〉。周雨 (編)，《大公報人憶舊》(頁200)。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Tang Zhenchang (1991). Shanghai Dagongbao yiji.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 (p. 200).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 唐振常 (1996)。《川上集》。北京：三聯書店。
- Tang Zhenchang (1996). *Chuangshang ji*.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徐鑄成 (2009a)。《舊聞雜憶》(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
- Xu Zhucheng (2009a). *Jiuwen zayi* (revised).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徐鑄成 (2009b)。《報人張季鸞先生傳》(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

- Xu Zhucheng (2009b). *Baoren Zhang Jiluan xiansheng zhuan* (revised).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徐鑄成 (2010a)。《報海舊聞》(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
- Xu Zhucheng (2010a). *Baohai jiuwen* (revised).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徐鑄成 (2010b)。《徐鑄成回憶錄》(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
- Xu Zhucheng (2010b). *Xu Zhucheng huiyilu* (xiuding ban).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 惜瑩 (1935)。〈新聞教育問題〉，《報學季刊》第1卷第3期。龍偉等(編)，(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84)。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Xi Ying (1935). *Xinwen jiaoyu wenti*, *Baoxue jikan*, 1(3). Long Wei et al. (Eds.). (2010),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84).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蓋伊·塔奇曼 (2008)。《做新聞》(麻爭旗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 Gaye Tuchman (2008). *Zuoxinwen* (Ma Zhengqi et.al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 黃克夫 (2002)。〈我考入桂林〈大公報〉為練習生的回憶〉。大公報一百周年報慶叢書編委會(編)，《我與〈大公報〉》(頁25)。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Huang Kefu (2002). *Wo kaoru Guilin Dagongbao wei lianxisheng de huiyi*. *Dagongbao yibai zhounian baoqing yanshu bianweihui* (Ed.). *Wo yu Dagongbao* (p. 25).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 蕭乾 (2010)。《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 Xiao Qian (2010). *Weidai ditu de lvren: Xiao Qian huiyilu*. Nanjing: Jiangshu wenyi chubanshe.
- 梁士純 (1936年5月9日)。〈中國新聞教育之現在與將來〉。《大公報》。
- Liang Shichun (May 9, 1936). *Zhongguo xinwen jiaoyu zhi xianzai yu jianglai*. *Dagongbao*.
- 梁漱溟 (2011a)。《鄉村建設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ang Suming (2011a). *Xiangcun jianshe lilu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梁漱溟 (2011b)。《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ang Suming (2011b). *Zhongguo wenhua yaoyi*.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梁漱溟 (2011c)。《人心與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iang Suming (2011c). *Renxin yu re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曾敏之 (2001)。〈報壇巨擘的風範——追憶胡政之先生二三事〉，《胡政之先生紀念文集》。胡政、王瑾 (編) (2009)，《回憶胡政之》(頁12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Zeng Minzhi (2001). Baotan jubu de fengfan—Zhuyi Hu Zhengzhi xiansheng ershan shi, Hu Zhengzhi xiansheng jinian wenji. Hu Mei & Wang Jin (Eds.). *Huiyi Fu Zhengzhi* (p. 12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蔣蔭恩 (1944)。〈新聞教育感想〉，《中國新聞學會年刊》第2期。龍偉等 (編)，(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18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Jiang Yin'en (1944). Xinwen jiaoyu ganxiang, *Zhongguo xinwen xuehui niankan*, 2. Long Wei et al.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185).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路鵬程 (2012a)。〈民國記者的關係網與新聞採集網〉。《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108-113。
- Lu Pengcheng (2012a). Minguo jizhe de guanxiwang yu xinwen caijiwang. *Guoji cinwen jie*, 2, 108-113.
- 路鵬程 (2012b)。〈論民國時期報人跳槽的動因及影響〉。《新聞記者》，第12期，頁34-41。
- Lu Pengcheng (2012b). Lun minguo shiqi baoren tiaocao de dongyin ji yingxiang. *Xinwen jizhe*, 12, 34-41.
- 詹若文 (1990)。〈報業全才胡政之與〈大公報〉〉，《經濟新聞研究》第47期。胡政、王瑾 (編) (2009)，《回憶胡政之》(頁1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Zhan Ruowen (1990). Baoye quancai Hu Zhengzhi yu Dagongbao. *Jingji xinwen yanjiu*, 47,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Fu Zhengzhi* (p. 103).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 詹文滸 (1944)。〈培養報業人才管見〉，《中國新聞學會年刊》第2期。龍偉等 (編) (2010)，《民國新聞教育史料選輯》(頁1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Zhan Wenhui (1944). Peiyang baoye rencai guanjian., *Zhongguo xinwen xuehui niankan*, 2. Long Wei et al. (2010). *Minguo xinwen jiaoyu shiliao xuanji* (p. 197).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曹世瑛 (1991)。〈從練習生到外勤課主任〉。周雨 (編)，《大公報人憶舊》(頁125)。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 Cao Shiying (1991). Cong lianxisheng dao waiqinke zhuren. Zhou Yu (Ed.). *Dagongbao ren yiji* (p. 125).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36期(2016)

曹谷冰、金誠夫(1991)。〈抗戰時期的大公報〉。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頁15)。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Cao Gubing, Jin Chengfu (1991). Kangzhan shiqi de Dagongbao. Zhouyu (Ed.). *Dagongbao ren yiji* (p. 15). Beijing: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德真(1949)。〈政之先生的一生〉《大公報》渝版1949年4月15日。胡玫、王瑾(編)(2009)，《回憶胡政之》(頁1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De Zhen (1949). Zhengzhi xiansheng de yisheng, *Dagongbao yuban* (April 15, 1949). Hu Mei & Wang Jin (Eds.). (2009), *Huiyi Fu Zhengzhi* (p. 15).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Deuze, M. (2006).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7(1), 19–34.

Reese, S. D., & Cohen, J. (2000). Educating for journ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cholarship. *Journalism Studies*, 1(2), 213–228.

本文引用格式

路鵬程(2016)。〈傳、幫、帶：民國新聞記者的職業社會化與組織社會化——以《大公報》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6期，頁35–68。